

D239

80-278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一)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

中共党史教研组编

一九八〇年五月

目 录

- 一、中央通告(十三号):关于叶贺失败(节录)……(1)
- 二、张国焘的报告……(9)
- 三、张太雷的报告——“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13)
- 四、周逸群的报告……(18)
- 五、李立三的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26)
- 六、高语罕给中央的报告——个人对于“八一事件”之经历及意见,对中央最近策略的意见……(43)
- 七、国焘致扩大会议函……(48)
- 八、中央常委给张国焘的复函……(57)
- 十、赵辀关于南昌暴动中二十军的斗争情况报告……(58)
- 九、张启图关于七十五团南昌暴动斗争经过之报告……(66)
- 十一、毛达关于“八一”革命之意义与叶贺军队之失败……(68)
- 十二、革命委员会委员就职典礼……(74)
- 十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令……(78)
- 十四、贺龙告本方面军全体官兵同志书……(80)
- 十五、叶挺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84)
- 十六、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示……(86)
- 十七、德兄并转军中全体同志……(87)
- 十八、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节录)……(99)

附 录

- 一、十六年南昌政变杂记(节录).....雷啸岑(100)
- 二、南昌暴动史.....王唯廉(105)
- 三、叶贺军失败的经过.....王唯廉(111)
- 四、南昌暴动史补遗.....王露布(114)
- 五、南昌暴动外史(节录).....王唯廉(118)
- 六、迷离恫恍之赣局.....(120)
- 七、混乱中之武汉现状.....(122)

中央通告(十三号):关于叶贺失败

一、关于南昌起义和南征的意义(略)

二、叶贺南征及其失败的经过

南昌暴动后，叶贺军队从南昌经过抚州、瑞金、会昌，遇敌钱大钧部及黄绍竑之一部，即攻击之，南昌暴动军虽遭重大损失，但却赢得极大胜利。会昌之后，叶贺没有遵循原定直下寻邬至梅县的计划，而改变路线，折回汀杭附近，再经大埔，直下潮汕。到潮汕后，敌陈济棠、王钧及黄绍竑部包围了他们并从各方面攻击之。

叶贺部的前锋于9月24日抵汕头，该地工农军也于30日起来。但在反革命的压力下，不得不放弃汕头，集中全部兵力于汤坑进行防御战。在这最后一仗中，敌军兵力1万5千人，我军只有5千人，持续了1天1夜，我军最后全部溃退。目前的现状是：原来留下守卫三河坝的25师，当主力往汕头后即被敌军切断，现尚有一千多人，已退往福建边境。汤坑之战后，叶挺只剩下7、8百人，退至甲子港，溃散了。贺龙20军的第1、第2师共2、3千人退至海陆丰。这部分队伍的军官的政治认识很混乱，自离开主力部队后即失去目标，最后竟乞求李济深收编。

三、叶贺起义失败后的政策

南昌起义军的失败的确是中国革命的失败——在工农武

装革命的开创时期，一支原先组织好的有训练的站在革命方面的军队不仅没有能够占领广东并开展土地革命，反而最后大部分溃散，确是重大损失。武汉政府反动后，中国革命进入一新时期——工农群众起义的时期，叶贺部的革命武装斗争不过是全国群众起义的补充而已。在新时期中我们最重要的政策是组织和坚持群众起义，叶贺南征只不过是这一总政策的一部分而已。我党武装起义的政策完全根据新阶段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我们只要考察从9月初到现在，湖北通城、通山、崇阳、咸宁、蒲圻、公安或黄安、石首、松滋、监利等县的农民，赤手空拳地起义，组织工农革命军，袭击县城，革命群众自己成立县政府；在乡下，又付与农会全部政权，没收土地和杀戮土豪劣绅……；在湖南，安源工人武装与农民武装一同起义，进攻醴陵，而株州的农军用一支抢进攻株州县城。萍乡和浏阳的农民已经同时起义，都夺得县城。长沙四周的农民已经起来暴动，而广州四周的农民也自4月14日李济深反革命政变以来起来暴动了。

只要考察上述情况，就能知道，革命的客观发展，已经到了工农革命的新阶段，我党的责任就是在各地区组织和准备，同时帮助和指导群众的武装起义，领导他们推翻新旧军阀、豪绅和资产阶级的政权。在这一总暴动之中，叶贺部自然有很大的影响。但是革命的基本力量一定不是叶贺部，而是工农群众。现在，叶贺部已经毫无疑问地失败了，但群众的力量则刚刚开始显示出来。（此处原件不清楚——英译者注）……武装起义和为夺取政权需要日渐滋长、扩大并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不仅湖南、湖北和广东是这样，现在就是浙江、江苏以及北方的河南、山西等省以至各省都存在这种现象。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够想象仅是叶贺部的失败，就是革

命的终结吗？自然不是。叶贺部的失败，只不过是军事上的失败。叶贺部能被敌军打散，但是工农群众的力量则一点也不能打散。我党准备、组织并发展工农武装起义的总政策应主动地推行下去。

所以，现在虽然没有立即用大军占领广州并夺得全省政权的可能，但广东各地区的农民起义仍在不断兴起，而叶贺余部也将“到农民中去”，帮助各地农民群众摧毁毫绅政权，建立农民群众自己的政权，领导他们奋发起来没收土地，……武装农民，组织工农革命军。叶贺余部将重新改组自身而变成工农革命军。

四、叶贺南征时我们主观方面的错误

叶贺军南征最后为什么失败？毫无疑问，敌军的兵力客观上大过于我军。国家压迫的全部力量交通工具都掌握在敌军手中；但是，在失败的全部原因中，我们主观方面的错误是很大的。

1. 前委政治计划方面的错误：在前委所制订的政治计划中，我党领导机关指导叶贺南征。关于土地问题，它提出“没收2百亩以上地主的土地”。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一类计划导致叶贺起义从根本上丧失意义。一位广东农民听到这一点后说：“这意味着耕者无其田！”这种批评的确无可反驳。

2. 战略上的错误：在叶贺军南征所经过的地方，对豪绅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战略不是坚决地摧毁他们的组织和政权，而在很大程度上采取小心翼翼的妥协策略。既不坚决地处决土豪劣绅，也不全部没收他们的武器，摧毁他们的财政机构和交通工具。他们不敢果断地实施没收财产的政策，而是采用旧军阀用分摊来征收税捐的办法，与之和平协商。他们有

礼地对待豪绅，当到达汕头后，贫农抢劫了财产，他们立即处决了其中的 3 人，“以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土豪劣绅和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广东一位工人说：“这是蒋介石第三的队伍”。这就是说，来到那儿的队伍，还不是工人农民的队伍，他们并不消灭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在叶贺部队中，“不扰民”的口号看起来似乎高于一切）。

3. 政治认识方面的错误：这支“蒋老三的耕者无其田”的队伍到达广东后又做些什么呢？他们要创建的是哪一类政权呢？自然，承受着这种计划和战略的队伍不会有明确的认识或对政权的理解。他们没有开创工人、农民和贫民政权的准备，他们也没有深入认识到自己可以在为工人、农民、贫民服务中练习掌握政权。他们只打算“继承国民党的正统”。他们不相信群众的力量。——群众革命专政的力量。他们不到群众中去创造真正军队的权力和群众的政治权力，而幻想他们自己成为象“孙大元帅”政府或国民党的国民政府这一类的军事权力。由此，（一）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发出委任书，派人与各色军队的领导人及地痞们谈判；（二）他们派人与张发奎谈判，受到各种狡猾手腕的欺骗。

4. 宣传工作中的错误：叶贺军在行军之中，对士兵没有足够的宣传工作和政治工作，在所到之处，对群众也不进行宣传。与此同时，敌军的宣传却非常猛烈，以至队伍到了抚州以南，大约有 10 天之久没有遇见一个人。这是因为朱培德等人的反革命宣传吓得群众逃离这些地方。我军却没有事先派人宣传，充分解释“八一革命”、南昌起义和南征的意义。

5. 军事上的错误：军事上的错误确实很大，这里不能详述。简单地说就是：南昌起义没有选择直下赣州和吉安的路线。如果这样做，第一，就能打败和击溃朱培德和钱大钧，

切断张发奎，阻止他们和李济深、黄绍竑的会合，改变他们目前包围和攻击我们的现状。第二，这是一条主要路线，沿途农民运动有相当基础，所到之地，都将可能摧毁豪绅政权，唤起农民群众，创建农民自己的政权，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农民，而最后把这些地方交给农民去守卫。南征所选择的经抚州、会昌、寻鄔的路线，穿过闽赣边荒芜穷困地区。而且恰恰是农民还没有发动起来的地区。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改变。但以上还只能说是一种可能性而已。

这是最明显的：一开头就存在着胆小地期待与张发奎合作的可能的倾向。关于不可靠的队伍，如蔡廷锴所部之类，他们采取了一种十分软弱而优柔寡断的政策，终致被蔡用欺骗的手段夺去了我军许多很好的队伍。特别是，当瑞金和会昌胜利后，他们没有跟踪追击，直下梅县，和那儿已经起来奋斗的农民军汇合，在该地发动农民起来，进攻并击溃黄绍竑等人所部敌军，然后直取兴宁和五华，占领整个东江地区。反而折回上杭和汀州，沿着避开敌人的路线行军。给敌军以10多天时间在优闲中从容部署。

总之，不论在政治上还是战略上，前委领导不能代表工人和农民，既没有明确的土地革命计划和工人、农民和贫民的政权，又没有摧毁豪绅政权的坚强战略——正如工人和农民所说：“耕者不得其田”，这是“蒋介石第三的队伍”。的确在这种机会主义的领导下的军队，怎能责备农民群众不起来帮助我们呢？农民群众自然不能出力量来帮助这种军队。事实是，叶贺军根本就没有去发动农民群众——前线领导只知道军队是主力，“革命委员会”是政权，而根本不相信群众的力量，也不发动群众去创建真正的群众政权。这样，他们就使富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八一革命”变成单纯的机会主

义行动。这是一切错误后面的根本错误。总之，这次失败不是由于农民没有援助军队，而是由于军队没有唤起工农群众，并阻碍了他们的革命斗争，因而导致失败。（例如：在普宁，当千百万农民群众包围该城并袭击豪绅们的巢窟之时，军队曾帮助他们，而当打败敌人，占领该城之后，他们却不许农民进城，不许杀戮土豪劣绅，说什么：这是维持秩序）。

6. 南方局在指导广东农民起来方面的错误。中央已去信指出并改正了政治计划和战术方面的错误（见《中央通讯》第6期）当叶贺军已经与广东农民联系之后，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一）在政治计划和口号方面，仍固执地决定土地少于50亩者不没收和仍提减租百分之三十的口号。（二）在战术方面，农军只作侧面进攻——单纯援助叶贺，只不过破坏了敌人的军事计划。南方局没有号召农民自己起来夺取政权和土地。所以，这里没有猛烈打击的战术。（三）根本地，他们没有发动农民群众，绝大部分或全部所谓起义依靠已经很好地组织起来的农民军的行动，或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不是农民群众的起义。（四）从地理上看，海南、高州、雷州的农民虽然起来了，但和全局无关。在西江方面，他们只和零散的有枪的兵痞（农民军和兵痞）打交道，没有到农民中去号召他们起来，以至敌黄绍竑部能够平安地通过这一地区。（五）他们不把广东农民运动作为主力，根本不发动群众，他们促使群众发展一种等待叶贺的心理。

自然，普通的工人和农民并没有深刻地理解他们应该自己起来夺取政权——这是我们政治宣传上的重大错误。我们党的机关的很多地方没有对反革命进行仔细的调查，以及夺取政权的任何种类的准备——这是我们技术工作中的错误。

五、叶贺失败的教训

(上略)叶贺试图改正他们在土地问题和政权问题上的错误，但是，太晚了，他们已经走上失败的道路。

我们已经走上工人、农民和贫农独立政权——苏维埃政权的路线。国民党已经死亡。

土地问题。我们必须了解“低层农民群众没收土地归自己所有”这一口号的意义。耕者须有其田，土地则应平分。这等同于土地国有。土地不能买卖。

劳动问题。我们的革命是一种很基本的革命。一天八小时工作……等，工农专政没收外国人和中国人的大银行、银行、大工业、交通工具国有化。所有小手工业按照劳动法经营。不严格按劳动法经营者没收。

战略问题，买办、豪绅和资产阶级须全部摧毁，不容许宽待。我们必须摧毁他们的全部机关权力、武装、财产、通讯和其它反革命工具。我们必须马上激励小资产阶级驱除恐惧心理，相信他们能推翻反动阶级。如果工农专政确立，将确实解放小资产阶级群众。所以，对小资产阶级客观上只有一条路——支持工人和农民。

军事问题。以前的所有革命，自1911年以来，都被指挥官抢夺过去。现在我们的革命将是士兵掉转枪口对准他们的指挥官，推翻国民党新军阀的权力。所以，所谓群众起义，必须是推翻上层阶级权力的行动，只有这种行动能产生工农革命。

党的问题，革命必须由共产党领导。而最重要的是一切政治领导必须由党掌握。因而必须在工农革命军中建立党代表制度。

在党内，我们必须摆脱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建

立一个真正群众性的、革命、阶级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担负起目前的责任，实现我们的目标。（下略）

1927年10月14日

（原载《中央通讯》第7期，第13—23页，1927年10月30日）

张 国 焘 报 告

诸位弟兄：

我相信，你们已经知道我们在潮汕失败这一不幸消息的概要，我、立三、代英、伯承、伯渠、玉章、贺龙、澎湃和平山已于十月七日全部到达陆丰，接着又相继来到香港，太雷和绮园在我前一日动身起港，但至今未到。我不知道他们的安全如何？恩来和希夷仍在军中。二十五师已自三河坝退至福建边境；二十军和二十四师现在陆丰，共有千余人。

欲知详情将有一个很长的故事可讲。记得当我奉命赴九江时，我们的军队已集中在南昌。我立即赶往南昌和前委的同志商量，当时，全体同志都赞成立即和张发奎决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开始行动是一回事，行动开始后如何发展是另一回事。主张行动的同志中有少数人（党内的政客和平山等），缺乏争夺领导权的观念。我们把我党的工作人员和国民党的工作人员以及军队政治部的工作人员等量齐观，混为一谈。这些人虽然赞成起义，但看不见前途。这是他们的普遍心理，因而应该称之为冒险主义。那时，军队中的同志还没有完全下定决心与张发奎决裂，而政客们对起义后应如何发展以及应取什么政策等等又毫无所知——我曾说他们“一点不为夺取政权而准备”，这样，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以及解决农民问题的规程等等都是匆匆忙忙决定的。

我们在南昌停留四天，不过只组织了一个革命委员会，

发表了一两篇宣言，并没有开展最起码的真正的政治运动。章伯钧一类的所谓政治工作人员普遍存在这种心理：反正有军队保护，不然就溜到国外去保全生命。

一、自南昌出发，在军事方面就发生了十师的叛变。二十个同志，范尽（译音）和其他人牺牲。如果我们对十师进行镇压，可阻止此事的发生。但由于缺乏为政权而斗争的准备，我们还是被出卖了。

自南昌出发时真是困难重重。最严重的问题是缺乏力夫。从南昌到抚州，一路上混乱不堪，大炮全部丢失，又丢了很多机关枪、两三千支步枪以及无数弹药。行军中谁也没有信心，上自官长，下至士兵，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到广东去。此时，同志中则产生以下几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认为无路可走，只好上山；第二种，认为眼下无生路，不如跟着部队去广东；第三种，认为我们在发宣言反对汪精卫等人时，不应那么太激烈；第四种，革命意志不纯。以上就是失败和逃散中的几种现象。南昌起义是正确的。但党在起义中所起的作用很小，而且完全缺乏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准备。平山常这样说：过去中央采取妥协政策，只有八一南昌起义才算真正把领导权掌握起来，从而开创了我党和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因此，它可以和十月革命相比。凡此种种，只能证明平山的左倾冒险主义。我们为夺取政权而招致如此惨重的失败，只能说是过去党的余毒的危害。

从抚州到瑞金，全程都是单纯的行军。在南昌我们弄到七十万纸币和十万现金。纸币几乎等于无用。没有什么事情是有计划地做成的。消极地说纪律很坏，由于行军中很难找到力夫和粮食，于是，强拉民夫，偷老百姓的鸡以至更坏的事都做出来了。这些，以二十军为最恶劣。

离开南昌时有三万一千人，到瑞金，上杭在打败钱大钧部之后只有八千人，因为十师叛变时带走了五千人，因病留在沿途或开小差的有七千人，瑞金、上杭一仗又损失了一千人。

在瑞金时，政治意识表现得更明确一些，我们讨论了：第一，政府组织形式；第二，政府的政策——土地革命；第三，利用国民党旗帜到什么地步；第四，财政政策；第五，扩兵问题，瑞昌胜利后，我们没有经寻邬过广东平原，而往福建的长汀，上杭，这确实是一个大错误。政治上同志们虽然主动地宣传土地革命，但却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土地革命应该怎样开展。政权形式仍利用国民党旗帜，因此，曾提出在州、市、县、区政府中开创工农占百分之九十的权力。同时也提出在上层用国民党政府的名义，而省、市、县以下用革命委员会的名义，目的是为着用从左边来一个清党，以此改组国民党。同时，还提出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号召来同汪精卫等人争传统，至于筹款，仍常用向土豪劣绅摊派老方法，关于我党组织和工农权力，在抚州到广东边境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什么可说。

在到达广东之前，我们本以为当地工农必然已有相当准备，但事实出乎意料之外。在我们所到之处，如大埔、三河坝、高陂、隘隍、潮州、汕头等地工农政权十分弱小。我们没有抢占梅县、兴华、五华以控制潮、汕的背部，而是住下潮、汕，反之，敌人则先把梅县、汤坑和丰顺一带有利地形占去，这样，我军成为潭中之渔，岂能不败。

汤坑一仗，敌军陈济棠、徐景唐、薛岳和王钧部共约一万五千人，我们二十军和二十四师只有五千人，黄绍竑包围并攻击潮安，我们只有一个团抵御，而那时二十五师又已离开而去三河坝。汤坑一仗持续两天两夜，我们伤亡二千人，

而敌军伤亡四千人，但我们最后仍不能击败敌人。潮安失守后，二十四师和二十军无法退往饶平与二十五师会合。他们当机立断地退到潮阳的广普，再去贵育（屿）、重广，重新集结于流沙和普宁。在流沙，我们开了紧急会议，但敌人进攻，会议被中断，我军大败，此后即不能再集合部队，我和其他人从各个方面奔往海边，即雇船至香港。

到香港后，我们和广东省委一起召开联席会议，得知广东张发奎和李济琛的冲突即将暴发。我们的同志们希望把工人和农民的力量聚集起来去夺取政权。于是会议决议：二十五师守福建边境，在潮安；廿四师和海陆丰农民集中于海陆丰；江西农民和泉海（海南岛）农民也聚集在一起。他们用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军队则抛弃国民革命军的名称和建制而称为工农革命军，此外则主动开展工农群众的斗争……等。革命委员会准备立即发表宣言。

总而言之，这次运动牺牲了许多同志的生命，但也还有许多人仍在忠诚地战斗着。十一军还不能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或工农的军队，只能称为有一大批共产党人在内的有训练的国民党军队。二十军只能称为同情我们的旧式军队。革命委员会十分慌乱，党组织十分松懈，党不能发挥作用，它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十分幼稚，毫无夺取政权的准备，因而，我们失败了，被敌人打散了，要求中央政治局对此事发表声明。贺龙和林伯渠等几位同志打算去苏联，要求中央派他们到那儿去。我将尽快回上海，向中央作一全面报告，我对“八七”会议决议和《告全党同志书》已略有所知，完全拥护。我希望不久回到上海并接受对我个人的处分，船快开了，紧张得很，特向你们全体致党的敬礼！

国焘 十月九日 （译文）

（《中央通讯》第七期1927.10.30）

张太雷报告

——在十月十五日南方局省委联席会议席上——
“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

这个报告分几个方面说：

（一）政策决定之经过：

我们首先说明中央决定南昌八一暴动，是决定在四省秋收暴动之后。此时解释要以农民为主力，去进行土地革命，并未丝毫依赖军事力量。后来南昌客观上容许我们动作，中央决定要动作，但只认定南昌暴动是四省暴动中的一部分，仅仅是土地革命的一个帮助，希望军队到广东来，能够与广东农民打成一片，绝不是希望单纯的军事的胜利，因为这是没有意思的。在南昌开会的时候，平山同志主张干，但他主张干的原因说是：贺龙主张，叶挺也同意干，故他也主张干。这完全是军事冒险的行动，绝不是如中央决定去干的政策一样，当时秋白把南昌的决定由浔带回汉口，中央已决定对张发奎的态度，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浔便解决他。故赞成南昌的决定，并派恩来去主持。同时国际并决定要干，内容详细我虽不知，但决定要干，我是知道的。后中央又派张国焘去，意思是要他去鼓动同志更

坚决的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张国焘假传圣旨，说国际不主张干，他也极力反对干，此时反而平山主张动，成为拥护新政策的一个人。国焘这不仅损伤了个人的信仰，而且是损伤中央的威信，因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次国焘的行动，实应受处分。因为这样结果致使这次暴动成为平山所领导。自然这个运动也变成了军事上的投机。

(二) 政治上的错误：

这次军行所至，与土地革命毫无关系，未曾帮助农民有蓬蓬勃勃的斗争，沿途只知道叫军士怎样守纪律不扰民，可以说这次我们的军队不是什么革命军，只算是王者之师，秋毫无犯。不准军士抢土豪、劣绅、地主之财物，甚至鸡犬亦不能擅取，宁愿饿肚。还算澎湃在乡村中杀了几十人。我们军队到的地方，并没到乡村中去骚扰，杀戮土劣。闻在汀州捉了十人，亦只勒索万元了事。到了汕头，更是沉寂，其情形闻之便要下泪，什么宣传、筹款打反动派，一概没有什么。闻说曾召集了一个大会，标语宣传不多。见警察跑了，我们不知把工农分子去代替，反去找回来，始有人站岗。在兵舰陆战队上岸那天，警察竟为内应，我们对警察还这样不忍杀戮，甚至公安局的名称都不肯改为政治保卫团。这虽是很小的事情，亦足见他们保守态度太深。

各地农民也没有得到军队的帮助，潮汕农民亦可动，潮阳农民自动起来，亦只派军队甚少去援助，普宁城派了一营人攻西城，军队竟服从防军之要求，不准农民入城大杀土劣，农民是非常不满意，觉得我们的军队与其他军队没有什么分别。大家都想把敌人打了克服广州，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遂不注意怎样趁军队力量所及的地方去起帮助土地革命进行之